

B
A
Q
I
A
N
L
I
L
U
Y
U
N
H
E
Y
U
E



郑晓江 / 著

八千里路云和月

——寻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

新 华 出 版 社



U Y U N H E Y U E

八千里路云和月

— 寻 访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人 的 足 迹 —

□ 郑晓江 /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千里路云和月:寻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郑晓江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

ISBN 7-5011-5748-0

I.八… II.郑… III.①哲学—研究—中国 ②文化—研究—中国 IV.①B2 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728 号

八千里路云和月

——寻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

郑晓江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35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一版 200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11-5748-0/B·34

定价:25.00 元

序
一

◎张岂之

(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经朋友介绍,南昌大学哲学系郑晓江教授的书稿《八千里路云和月》、副题《寻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我得以先睹为快。在读过书稿以后,我觉得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研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书稿。之所以说是“别具一格”,因为其写法与一般哲学史专著不同,他没有着重分析中国哲学或古代中国哲学大师们的哲学体系(应当承认是有体系的)、范畴、基本命题,而是通过对于这些大师们的经历、行踪,给我们具体生动地描绘出他们的心态、兴趣、对人生和世界的某些最基本的看法。因为晓江要追踪他们的足迹,不能不行万里路;这并不是为了欣赏风景。要努力将前人的遗迹与其当时的思路联系起来,还必须读万卷书,这些都要付出很大的精力。晓江三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心血就体现在这部书稿中。

《八千里路云和月》有一篇自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经典解读”、“思想考古”、“生命



情怀”、“疲身累心”等方面阐述了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心路历程,是全书的总纲,作者花费了很大精力才写成的研究心得。我读了这篇《自序》,觉得很有启迪。如果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只限于“经典的解读”,不和“经典”作者的“行迹”联系起来,对于“经典”的理解会有很大的限制,而且“经典”本身恐怕也很难全部反映其作者的心路历程,因此晓江试图在研究上、特别是在普及中国思想文化知识方面开拓一条新路,他称之为“思想考古”。他这样解释:“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史料语焉不详的问题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这不但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而且有了丰硕成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为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及普及化,不但在研究方法上应有所创新,而且在勾勒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亦应力求立体化,使更多的读者能从中受益。

晓江的上述看法很有见地,不过,由于是刚刚运用,因而他的这部书稿中将前人的“行迹”与其思想的联系,似乎有些地方挖掘的还不是

太深，也许是更多地照顾到普及的需要，有些关于研究的分析省略了。如果一开始便完美无缺，那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了。

书稿的“行迹”似乎过于浓重，思考的厚度有些地方还没有来得及和“行迹”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我对于“思想考古”的提法提出一点修正，叫做“思想访古”，这和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好像还不是一回事。

不论叫“思想考古”或“思想访古”，晓江的这部书稿总会带动人们去读、去理解古代哲人的思想的。我觉得，他笔下的周敦颐、陆象山、陆梭山等写的特别丰满。在《光风霁月周敦颐》的“风雨‘观莲阁’”中，给读者描绘了江西星子县（庐山之南）谯楼后面的“爱莲池”，晓江这样描述：“进得大门，一长方形大池约有300多平方米，注一汪清水，片片碧绿的荷叶正随风摇晃，点点粉荷点缀在绿叶丛中，分外娇艳。悠悠的荷花香飘浮在空中，带来的全都是濂溪先生《爱莲说》的优美音符……”。晓江经过考证，认为《爱莲说》并非写于爱莲池，并对星子的爱莲池的来源作了说明。不仅如此，晓江关于周敦颐的从政观念不是取“人生政治化”，而是走“政治人生化”之路，是颇为深刻的。

在我看来，书稿的少量部分写有欠缺一些，比如《儒者担当王夫之》，只靠对于船山先生的隐居之地——衡阳“湘西草堂”的描述和解析，



那是很难全面概括船山精深博大的思想学说，因此，我看了这一部分觉得有些不足，好像还有应当说的话，作者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完全说出来。我提出这个问题，晓江说他的这本书稿着重从普及化方面去写的，至于专门论述思想家的思想，如《论陶渊明的生死观》、《梭山先生的行与思》、《论周敦颐的人生哲学》、《陆九渊的人生精神及其现代价值》等已用专题论文的形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现在为书稿写《序》，总是在肯定方面落墨，而我写的这个短序，觉得晓江的方法可以尝试实践下去，以便做出更大的成绩。初试锋芒，应当肯定。既是“初试”便不能没有一点不足。总之，实地考察思想家们的行迹，要和他们的思想紧扣起来，尚需继续实践，而落墨的最后点应是“思想”而不是“行迹”。我想，读者们是会喜欢这本书的，同时我也希望晓江的下一部著作将会比《八千里路云和月》有更大的进展。

2002年3月22日

序 二

◎ 蔡仁厚

(台湾东海大学教授)

语云：“地灵人杰”，又云“人杰地灵”。山河大地的灵秀之气，可以孕育杰出的人才；反过来，卓然杰出的人才，也可以印证山河之秀与地气之灵。据此而言，自然山水的灵秀雄奇与人物人文的贤善美穆，实在是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的。

记得二十年前(1982年)，我应邀前赴夏威夷大学出席“国际朱熹会议”，回台之后写了一篇会议后记，在最后一节“尾声”文中，我很直率地说夏威夷是一个“只有自然，没有历史；只有文明，没有文化”的地方。我还说：请你不要问我“文明”和“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我只是自己心里有个比较。前二年我写《韩国纪行》时，好像充满着人文的气息和深心的感怀。而现在写这篇《后记》，却完全欠缺那种心情和感受。我可以承认夏威夷是世外桃源，是观光胜地，那里的人很和善，很有礼貌，而且是一个没有灰尘的地方。偶而我也会从某种角度对那里有一份羨



慕之意，但却不可能对它发出怀念之情。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是无法使人怀念兴感的。我这段话，说得很真心。

我一向认为，“自然”必须加上“人文”，才够美，才能使空间的风景伸展到古往今来的时间流里，而令人俯仰兴思，留连低回。中国的名胜古迹，古刹庙宇，全都是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人在其中，既可以神游千古，也可以心通天地。可惜现代的中国人，对这个意思反而不甚了了。真叫人憾恨而又感愧。

现在好了，有人要效法太史公在“读万卷书”之余，更要“行万里路”。他要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浩瀚空间里，寻访那些不朽的古先贤哲，这个人就是南昌大学哲学系的郑晓江教授。他勤于著述，已出版了好多本书，现在又以历史学的实地考察，来体现思想考古的实效。他不辞辛劳，走遍很多的偏僻的乡村，走过不少崎岖的山路，从祠宇、碑碣、荒墓之间，从残存的文献和故老的口头上，探得了许多珍贵的典故旧事，厘清了一些存疑的思想关结，显露了若干隐晦的事迹。古人有知，当惊喜千百年后犹有知音；山水有灵，更应欣悦学院中人也能行走“空谷”而留下“足音”。此书作者足迹所经，虽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他寻访历代学术文化大师的遗踪，写出他们的愤悱、思绪，吐露他们的心声、衷怀。既具体而信实，又生动而活泼。在这方面，却又

非徐霞客可比了。

本书寻访的古人，有异人、有禅师、有伤心人别有怀抱而哭笑不得的遗老僧人，也有诗人、画家、政治家、理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等。如果读者意犹未尽，便请作者再来一度“八千里路云和月”，或者读者自己起而效之，也来行万里路，与古人相遇于旦暮。文山《正气歌》末句云：“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其实，古人之道，不只在风檐，在书中，也在山间水边，在日光月色之下。宇宙不隔，古今同在。让我们华夏子孙，化小我为大我，走进历史，走向广宇长宙，和各式各样的古人相见相晤。或高谈阔论，或轻声细语，或剧论争议，或击节叹赏，各随其意，各畅其志，岂不快哉！是为序。

2002年3月29日

于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

自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自1999年以来,我前后耗时三年,行程上万公里,对13个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大师的遗踪进行了深入地寻访。我与同事或乘车或驾船,或行路或爬山,流连在那些曾留有大师遗迹的青山秀水、荒村野径、大街小巷,去深深地体验他们的生活之境,寻觅他们的思想文化艺术之灵,特别是感悟他们的生命之魂……

经典解读

我是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教学研究工作的,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为生死哲学,为何要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如此大的精力,特别是有时还要冒巨大的旅途风险,去从事这样一项似乎与书斋型的研究不太相干又有些格格不入的工作?特别是,最后我又为何写成了这样一本不知是何文体的小书?

这与我对中国哲学史与中国人生哲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多年的反思有关。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人生哲学研究中长期运用的主要方法

是:经典的解读及理论的分析。即对某个思想家的著作及文章进行研读,由字、词、句、文而达思想家的意思,然后运用通行的哲学理论的范畴、概念、原理加以分析、整理,形成一个系统,由面的研究、量的研究、意义的研究,再到质的研究,最后往往是定性,说明其对错优劣好坏等等。这一沿袭的方法无疑是重要的、卓有成效的,也是中国哲学史与中国人生哲学研究中的主流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就是惟一的、就是完全没有问题或缺陷的。

一方面,思想家写出的东西并非完全与其所想一致,常常是言不达意、词不表意,文不尽意,在思想家的著作之后,往往还有更为深刻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另一方面,思想家思想的变化远远大于其著作中表述的观念,而这种变化往往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此外,更重要的是,人们著书立说,尤其是中国古人著书为文往往并非追求所谓客观真理,有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春秋笔法”等写作“原则”,并且人们创作时又总是以青史留名为目的。所以,在写文章与写书的过程中,古代的思想家往往追求价值上的好,表述的是光明的一面,优美的一面,辉煌的一面。在这样一种价值的追求中,许多东西被刻意回避,许多东西被有意识地隐蔽起来、深藏起来。因此,仅仅从经典的解读入手去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其实,文字性的东西不能完全表达作者之意,而语言也不可能完全表述说者之思,在中国古代学者那里早就有所讨论。《周易·系辞传》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孟子也曾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王弼更言:“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

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中国的文字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具有表征性、空灵性的特征；中国哲学又有着《易》之由“象”悟“意”的传统，所以，今人对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往往不易做纯逻辑性的分析。古人著作背后隐藏的东西也许比从字面上所能看出的东西要多，而思想家没有写入著作的东西比其书肯定也要多得多。这就使经典解读的方法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与困难，尤其是如果仅仅局限在从经典去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就会忽略很多东西，甚至会把一些对思想家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遗漏掉，这就是经典解读法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人生哲学研究中所可能产生的问题。

思想考古

这样，我们必须引入一些其他的方法以为补充，我近些年来就经常运用思想考古的方法，而这本小书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成果。

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田野调查的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史料语焉不详的问题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这样一种方法就非仅仅从典籍的解读中去理解

思想家,因为有实地的考察,就能够借助于研究对象所生活过的场景去更深入地体会思想家之所思所行,越过时间的间隔去与研究对象处于同一空间,让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超越历史地合为一体,从而能够更好地透析、理解、把握思想家思想的全貌。

就我个人而言,为何会想到并运用思想考古的方法于研究的工作中呢?我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主攻则在中国人生哲学和死亡哲学。我曾经耗费十年,写成了《中国人生精神》与《西方人生精神》二书,后又由人生问题的探讨延伸至死亡问题,写出了《中国死亡智慧》《超越死亡》等书。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先对经典进行解读,之后则提升出若干观念进行分类,再就是逻辑的叙述,最后将这些分析出来的东西与思想史的发展作一比较,引伸出其优点与缺陷,阐明其影响和地位。这样的方法当然也有其优越性,但我后来进行了一些反省,发现:若从人生观与死亡观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思想必有一个变化相当大的过程,生死观可以说是个我化色彩最强的思想系统;而且更成问题的是,人们说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与其真实的生活、人生的践履有区别,有时区别还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仅仅局限在文献的研究和解读中是很难真正把握中国人生哲学史的全貌的,尤其是不能深入地体验思想家的生命情怀和生活意境。在这样一个思想反省的基础上,我逐步走出书斋和课堂,深入田野和乡村、城镇与山川,进行思想考古的工作,虽然精力时间花费得相当大,但是,收获也是很大的,得到了许多在经典中书斋里得不到的东西,大大推进了我对中国人生哲学的研究。

行走历史

思想考古的方法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建基于两个方法之上:一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具有悠久传统的“行走历史”的方法。吴仁安先生介绍说:实地历史考察古已有之,“司马迁青年时代不仅阅读了大量的皇家藏书,而且游历了大江南北不少名山大川,到处寻访历史遗迹,考察各地风俗民情,这就为他日后写作不朽的史学名著《史记》打下了深厚而扎实的基础。明清之际的顾炎武(1613—1682),也是一位游历四方、注重实地历史考察的大学问家。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广泛进行实地历史考察实践活动的产物。顾炎武不仅注重书本中的实证,而且十分注意实地历史考察活动,他反对‘琐琐于典籍文字之间,而不稽之于道理徒步之下’的汉儒学风。他的学生潘耒曾称:‘(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序》)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也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车自随。所至塞,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清代史学开拓者之一万斯同年轻时就勤奋好学,‘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他又‘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遗书考向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这种书本知识与实地历史考察相结合的学习,终于使万斯同成为一位卓越的史学家。”现代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也很注重实地历史考察:“尝游历陕西、晋北、金陵、广州以及名山大川,访求遗文旧事,并旁

通目录、版本、校讎、金石、考古等学。”他讲学之余，赴南京郊外作古迹调查，在江宁、当涂、丹阳等地，发现六朝陵墓十三所，撰写调查报告《六朝陵墓调查报告》。著名史学家翦伯赞1961年曾去内蒙古地区进行实地历史考察，回京之后写出了蜚声海内外的《内蒙古访古》。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十分重视实地历史考察，说：“搞历史地理还有一项基本功，那就是翻活地图——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1974年，他承担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编》的任务时，就与“一些同志一起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考察了长江和洞庭湖水系，在河南、河北两省考察了黄河下游的故道。”吴仁安先生指出：“实地历史考察，是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方法。亲临历史人物事件活动场所实地历史考察，有助于真切地了解历史本来面目。笔者对此深有体会。”（参见《历史研究与实地历史考察》，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可见，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中，实地考察历史事件发生地的方法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而且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学者们奉行的一项重要方法。

思想考古与历史学的实地考察有相通的地方，都是亲赴实地进行细致地调查研究，与所研究的对象保持一种无间隔的接触。但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思想考古主要在考察思想家生存之地，重在从中体会思想家之观念的背后的东西，以及没有表露出来的精神内容；而历史的实地考察，则主要在调查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和挖掘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内容。

思想考古方法的来源之二是：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年鉴学派。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认为：历史学必须是“总体史学”或“综合史学”，历史学科



的主要任务应该把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总体史学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将是社会科学中心和心脏，将是不同角度，即从社会、心理、道德、宗教、美学角度，最后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角度来研究社会的所有一切科学的焦点。”其次，年鉴学派主张用“问题史学”代替“叙述史学”。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还主张，必须通过现在和过去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历史。他们认为，并不存在历史学家一寻找就会发现的所谓客观的、现成的历史。一般的文字史料都浸透了作者的主观性而不尽可靠。费弗尔说：“人并未记牢历史；人总是在构造它……他没有把过去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像北冰洋冷藏住百万年之久的猛犸似的。他从现在出发，他总是通过自己来认识和理解过去。”所以，历史既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历史学家要借助过去研究现在，也要根据现在来探索过去。费弗尔说：“通过今天生活在人类现实中的人们并且为了他们而重视过去人类的社会和状态”。为此，历史研究必须放在更为广泛的范围里进行，过去历史学中只见国王、将军和外交家的现象必须改正。历史学家要写出自下而上的历史，要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生老病死、爱情婚姻等反映出来。这样，历史学家要突破原有的档案文字材料的局限，利用人类一切的创造物，如税收清册、膳食谱、教区登记簿、家庭遗嘱、土地制度、项圈、手镯等（参见《西方史学史纲》宋瑞芝等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328页）。

从年鉴学派的主张可以看出，人们具体的普通的生活亦